

试论建国初期的宗教革新运动

陈金龙

内容提要 建国初期，中国基督教、天主教为摆脱外国势力的控制，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相继进行了革新运动。本文主要探讨了宗教革新运动的缘起，中共推进宗教革新运动的基本方针和宗教革新运动的历史作用。

关键词 建国初期 宗教 革新运动

【中图分类号】B9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 (2002) 05-0133-07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中国基督教、天主教革新运动的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确保了宗教革新运动的顺利进行。宗教革新运动的开展对中国宗教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其特殊的历史作用。

一、宗教革新运动的缘起

按照各国通例，一个主权国家的宗教事业，理应由本国宗教徒自办，而建国之初中国基督教、天主教的控制权实际上仍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遗产”，与新中国的形象极不相称。其实，宗教自立运动由来已久，而建国初期宗教革新运动的兴起，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主权国家必然采取的举措，更是中国宗教界的强烈愿望。

1. 近代自立运动的受挫。众所周知，天主教、基督教的大规模传入中国，是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扩张相伴随的。我国学者蒋梦麟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来佛是骑着白马来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西方天主教会、基督教会和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且以武力为后盾，享有种种特权，控制了中国的教会，许多教堂甚至悬挂外国国旗，因而大大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也正因如此，早在19世纪，中国教会内部的爱国人士，就开展了“自立运动”，要求摆脱外国教会的束缚与控制，实现独立，自办教会。1873年，基督徒陈梦南在广东肇庆建

立了独立的“中华福音会”，开了中国人自办教会的先河。1906年，俞国楨在上海建立了“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以反对外国教会的控制。20世纪上半叶，基督教界爱国人士发起的本色教会运动，也是力图削弱外国教会的控制，逐步实现自治、自传、自养的有益尝试。但历史已经证明，没有国家的独立，也就不会有教会的独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想完全取得教会的自主权，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据统计，1949年，中国基督教会虽然已经拥有70万信徒，但仍然不过是西方130多个大小教会的附庸而已。许多教会不仅在政治上毫无自主可言，而且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西方教会。而据1946年的统计，中国天主教20个总主教中，外国籍占17人，中国籍仅3人；在143个教区中，外国籍主教有110多人，中国籍主教只有20多人。这说明，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教会仍为西方所控制，这是一个主权国家所不能接受和容忍的。

2. 西方教会的“应变”措施与敌对行径。新中国成立前后，西方传教士多次召开“应变会议”，作出各种“应变策划”。当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西方传教士的基本应变方案是“安定教牧人心”和“勉励”教牧人员“坚守岗位”。广州将近解放时，传教士黎伯廉(A. H. Bray)就对中国教牧人员说：“中国政局时常变，现在这个局面(指解放)不会长久，至多五年就会有变化，你们要坚守岗位，共产

党经济无办法，到时要垮台。”^①正因为如此，他们根本就没有作撤退的打算，而是希望留下来继续活动。如挪威、美国驻广州领事馆的官员撤退时，并没有下令叫传教士撤退。相反，一些已经离开中国的“老手”，又被重新派来中国。如英国循道会的代表黎伯廉，于 1939 年已离开中国，可 1949 年 7、8 月的教会会议又决定再派他来中国重任教会代表。北美长老会的代表区戴义 (M.S. Ady) 在 1949 年上半年已经回国，但在 1950 年广州解放后，又被派遣回来，任该差会驻香港的代表。西方传教士留下来和重派“老手”回来，其目的何在呢？用他们自己的口吻来说，是“应变”，换言之，就是对付共产党，对付人民解放事业。为此，他们首先制造一种恐怖心理，说什么“共产党迫害宗教”、“共产党消灭宗教”，好象一切宗教都已“大难临头”，大家要一齐来“应变”，甚至号召教徒起来“应付共产党的挑战”。再如，1948 年，当蒋介石在内战中节节败退之时，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就提出了所谓应变措施。它将大部分美国干事和眷属从中国撤走，只留下所谓关键性人物；经济上也作了分散储存的安排，企图解放后继续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北美协会将美国干事全部撤走，其负责人亲自来到香港，约协会总干事前往会谈，制定了一个“三年经济与工作计划”，由北美协会一次拨出大笔津贴，维持三年，企图三年之后卷土重来。此外，还把从中国撤退的美国干事安置在香港、台北、汉城、东京等地，以等待时机^②。

新中国成立后，梵帝冈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与中国人民为敌。当时的教皇庇护十二，多次发出秘密“通谕”和命令，煽动中国天主教徒反对人民政府，反对共产党，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如 1952 年 1 月 18 日发出的“致中国天主教徒通谕”及 1954 年 10 月 7 日发出的“致中国总主教和其余教区司铎及服膺宗座的信友通谕”等，都是以煽动中国天主教徒反对人民政府、反对共产党、破坏我国的社

会主义事业为目的的。对于这一行径，我国政府自然不会容忍。在驱逐了梵帝冈驻华公使黎培里和外籍传教士、接收了教会经营的学校、医院和救济机关之后，梵帝冈又指使和支持暗藏在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对我国进行各种破坏活动。1955 年 9 月，上海公安机关就破获了暗藏在天主教内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他们明目张胆地提出：“爱国就不能爱教”，“教徒不能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对于国家的一切政策和一切重大的措施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破坏。对于这一在外国宗教势力指挥下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集团，我们采取了果断措施，对其罪行给予了充分的揭露。对此，罗马教庭进行了反扑，声称龚品梅是“最称职的主教”，指责上海自选的主教是非法的，并“绝罚”（开除教籍的处分）爱国的神职人员，警告教徒不准参加爱国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任何宗教组织。天主教内一些反动高级神职人员与之遥相呼应，声称对罗马教庭“必须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不按罗马教庭命令办事就是背教、裂教”。

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后，外国势力仍想控制、主宰中国的教会，不进行宗教革新运动，就不会有中国教会的独立自主。

3. 中国宗教界的强烈愿望。开展宗教革新运动，实现中国教会的自治、自养、自传，也是中国宗教界的心声。1948 年 4 月，吴耀宗便在《天风》上发表《基督教的时代悲剧》一文，明确指出中国基督教已被帝国主义利用为侵略中国的工具，强调世界在发展，基督教不能依靠资本主义，否则就会被时代淘汰。吴先生的这篇文章招来了在上海的西方传教士的忌恨，他因此也失去了《天风》社社长的职务。新中国成立后，宗教界要求开展革新运动的愿

^① 能真冲：《解放前后帝国主义传教士在广东的阴谋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6 辑（1962 年 9 月），第 112 页。

^② 参见江文汉：《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19 辑，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27 页。

望则更为强烈了。1950年7月28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组主任吴耀宗、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邓裕志、北京燕京大学教授兼宗教学学院院长赵紫宸、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事工组主任刘良模等40名基督教代表人物，联名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宣言提出两条基本方针：一是“以最大的努力及有效的方法，使教会群众清楚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所造成的罪恶，认识过去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事实，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警惕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以培养反动力量的阴谋”；二是“培养一般信徒爱国民主的精神，和自尊自信的心理，中国基督教过去所倡导的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已有相当成就，今后应在最短期内，完成此项任务”^①。宣言发表之后，在广大教徒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截至8月底，第一批签名者已达1527人。

1950年11月30日，四川省广元县天主教神甫王良佐和500余名教徒联合发表了《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主张中国天主教与帝国主义者割断各方面的关系，独立自主自办教会。这一正义行动立即在全国天主教界引起强烈反响。同年12月19日，归绥市天主教也发表了“与帝国主义割断一切关系”的宣言。紧接着，重庆、南昌、武汉等地的代主教、神父、教徒也相继发表了同一性质的宣言。

因此，通过开展宗教革新运动，实现中国宗教的自治、自养、自传，也是中国宗教界的迫切愿望。

二、宗教革新运动的基本方针

中国共产党是宗教革新运动的积极引导者和推动者，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等中共领导人对基督教、天主教的革新运动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为引导和推动建国初期基督教、天主教的革新运动，中共提出了一系列基本方针：

1. 中国的宗教应由中国人自己来办。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一再申明：中国的宗教应由中国人自己来办，基督教、天主教

应该实现自治、自养、自传。1950年5月，周恩来在北京三次接见了基督教界的代表。此前，吴耀宗等组成了一个“访问团”，赴杭州、南昌、长沙、开封、西安、济南等地了解教会在建国初的情况，在各地搜集了有关教会的问题一百多件，准备向周恩来反映，并希望政府下一道“命令”保护各地教会。周恩来认为，所谓教会问题，不是简单由中央政府发出一道命令可以解决的，根本问题是长期以来广大人民群众把基督教看作“洋教”，看作帝国主义用来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工具。因此根本办法是中国的教会应当自办，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②。1950年4月，他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主张宗教要同帝国主义割断联系。如中国天主教还受梵蒂冈的指挥就不行。中国的宗教应该由中国人来办。”^③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又强调：“在宗教关系上，要帮助宗教界人士割断同帝国主义的关系，赞助他们‘自己办宗教，自演自唱，不要外国人来传教’。”^④

1950年7月28日，吴耀宗等40名基督教代表人物联名发表的《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其中心内容，便是割断中国基督教同帝国主义的联系，实行自治、自养、自传，以达到革新中国基督教的目标。吴耀宗等人起草的宣言，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充分肯定。宣言发表之前，毛泽东就写下了这样的批语：“吴耀宗文件是很有用的，请考虑用内部文件方式电告各中央局及各省市市委，并要他们注意赞助。”^⑤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9

① 《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

② 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2辑，文史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页。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86页。

④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

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38页。

月 23 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由宗教界人士 1527 人签名的宣言,并发表了题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社论高度评价了宣言,认为它是“中国基督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并且指出:“我们欢迎基督教人士所发起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这是基督教人士应有的使中国基督教脱离帝国主义影响而走上宗教正轨的爱国运动。”^①

1950 年 11 月 30 日,《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发表后,不仅受到各界人民欢迎,也得到党和政府的支持。同年 12 月 25 日,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个宣言。1951 年 1 月 8 日,《人民日报》以《欢迎天主教界的爱国运动》为题发表了社论。为了由上而下地推动天主教的革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于 1951 年 1 月 17 日邀请华北地区天主教的主要上层人士 40 余人举行了茶话会。周恩来在讲话中,详细解释了政府对于天主教的政策,再次号召中国天主教徒心向祖国,割断教会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实现自治、自养、自传的方针。到会的天主教徒表示响应政府的号召。

因此,建国初期,中共关于基督教、天主教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办的方针是非常明确的,基督教、天主教要通过革新实现自治、自养、自传的立场是十分坚定的。

2. 开展宗教革新运动要讲究策略。宗教革新既涉及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也涉及国内广大的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上层人士,情况比较复杂,任务十分艰巨。因此,中共在引导宗教界开展这一运动时,强调在运动中应讲究策略,并提出了一系列足以保证运动顺利推进的正确策略。

1950 年 3 月,李维汉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便提出:“对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即应通过其中的进步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积极争取团结其中的中间分子和落后群众,孤立少数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服务的分子,从其内部展开民族民主觉醒运动,使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真正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国内反动势力割断联系,成为‘自治’、‘自给’、‘自传’的宗教团

体。”^②在这里,李维汉不仅明确提出了开展爱国革新运动的任务,而且对其基本策略也作了具体阐述,即依靠进步力量和爱国力量,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从宗教界内部进行突破。

为了推动基督教的爱国革新运动,1950 年 8 月 19 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指示》提出:为了把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教会,变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宗教事业,需要进行一系列艰苦的复杂的工作,现在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在基督教、天主教内部,利用各种机会和经过有爱国心的教徒,向教徒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揭露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与间谍活动的阴谋,领导和支持其中的爱国分子,团结虔诚的教徒的大多数,反对仍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少数反动分子,有步骤地使教会摆脱帝国主义的影响及其经济关系,把教会变为由中国人自治、自传、自养的宗教事业。”《指示》还要求:对于吴耀宗等发起的签名运动,“各地的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应从旁予以适当的赞助,经过适当关系,组织有爱国心的教徒,签名响应,并在教徒中进行宣传。”当时,天主教中尚未发起爱国革新运动,《指示》要求“各地注意团结天主教徒中有爱国心的分子,以求在适当时机发起同一运动。”^③在这里,中共重申了依靠爱国分子、

团结多数、反对少数的方针,并且要求宗教革新运动“有步骤”地进行和主要依靠宗教界自己的力量来进行,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只能“从旁予以适当的赞助”,而不可越俎代庖。这里还特别强调:基督教和天主教的革新运动要同时进行;在开展革新运动的过程中,要注意“宣传”,“揭露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与间谍活动的阴谋”,也就是说要通过宣传,使广大教徒认识到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罪行与实质。事实上,在开展革新运动的过程中,各地基督教、天主教都进行

① 《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1950 年 9 月 23 日《人民日报》。

② 《李维汉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21 页。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08、410 页。

了广泛宣传,控诉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罪行和破坏“三自”革新运动的行径。通过宣传,提高了广大教徒对爱国革新运动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宗教革新运动的开展。

1951年3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积极推进宗教革新运动的指示》,对开展宗教革新运动的方针、策略与步骤,作了具体的规定。《指示》指出:为了顺利推进天主教、基督教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必须有下列四个条件,即:(一)政府积极出面推动;(二)不怕麻烦与其上层的中国领导人谈判,但须完全撇开外国人;(三)在其下层教徒中进行爱国的教育,发动他们逼迫上层实行自治、自养、自传;(四)对教会的各个单位(教堂、团体)要切实与其中国负责人商量,经济上准备解决其自养问题。这里所说的四个条件,实际上也是开展宗教革新运动的策略。《指示》认为,为了开展宗教革新运动,我们应采取积极领导而不是消极等待的政策,以往的经验证明,“基督教、天主教的任何有效的革新运动,都不可能是教徒的自发运动,而只能在党和人民政府积极领导督促下发生和发展”。为此,《指示》要求各大行政区及各省、市,迅速由文教委员会或文教厅(局)出面,邀请当地天主教、基督教中的上层分子及进步分子举行茶话会或座谈会,使发动下层的工作与上层的推动工作相结合^①。这一《指示》较之此前下发的《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强调了党和政府在运动中的“领导”、“督促”作用,并提出了由下至上、上下结合和区别对待等新的方针。《指示》的发表,有力地推动了当时业已展开的宗教革新运动。

在开展革新运动的过程中,中共注意推广各地的经验和利用宗教界人士自己教育自己。1951年3月13日,《光明日报》刊载了《天津天主教徒奋斗前进 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和《和天主教友们谈怎样爱教》两篇文章。其中,《天津天主教徒奋斗前进 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一文,介绍了天津天主教开展自立革新运动的情况;《和天主教友们谈怎样爱教》一文,所谈则是天主教徒自己的切身感受和体会。

对于这两篇文章,毛泽东十分重视,就其转载一事亲自致信胡乔木。信中指出:“3月13日光明日报载有一篇天津通讯,题为《天津天主教徒奋斗前进 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写得很好,请予广播,并在人民日报转载。同日该报还登了天津津沽大学教授张羽时的一篇文章,题为《和天主教教友们谈怎样爱教》,说明天主教革新的理论根据,很有说服力,请考虑在人民日报转载。”^②后来,有关单位分别广播和转载了这两篇文章。

总之,加强领导,依靠上层,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区别对待,上下结合,广泛宣传,自我教育,推广经验,都是中共提出的推动建国初期宗教革新运动的基本策略。实践证明,这些策略是行之有效的,保证了宗教革新运动的顺利进行。

3. 要实现自治、自传,首先必须做到自养。开展自治、自养、自传运动,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自养。自养问题不解决,自治、自传就将难以成为现实。所谓自养,就是要脱离与外国的经济关系,尤其是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宗教革新运动开展后,1950年11月28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在安理会发表侮辱中国人民的演说,把100多年来美国为侵略中国而兴办的文教、卫生、救济和宗教事业,统统说成是对中国的“友谊”,并妄言中国人民要生存必须仰赖美国的“救济”,这激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公愤。12月16日,美国宣布冻结其管辖区内的中国公私财产,并禁止在美国注册的船只驶往中国港口。针对美国的这一无理措施,28日,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命令,管制并清查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在华的一切财产,并冻结美国在华公私存款。2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出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对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分别由政府接办或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94-96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64页。

由中国人自办。对接受美国津贴的宗教团体，完全改由中国教徒自办。同时，对中国天主教、基督教在自治、自养、自传中遇到的暂时困难，政府给予支持和帮助。这一决定的出台，进一步推动了宗教界的爱国革新运动。

1951年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积极推进宗教革新运动的指示》，进一步指出：要实现自治、自传，必须由全体教徒努力自养，强调了自养在“三自”革新运动中的特殊重要性。紧接着，4月16日至21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邀请全国31个基督教宗派和26个基督教团体的代表参加。会议通过并由政务院于7月24日公布的《对于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处理办法》，其主要内容就是要帮助基督教解决割断帝国主义关系和实行“三自”革新之后而产生的一些困难。据与会人员反映，这个由政府主动提出的“处理办法”，在某些方面超出了出席会议代表的期望。这次会议进一步缩短了政府和基督教群众之间的距离，再次用事实表明政府尊重和关心基督教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决心。

在宗教革新运动的过程中，还涉及到一个教产的处理问题。教产是指教堂及附属房屋和教会出租的房产。天主教、基督教的教产曾被帝国主义用来作为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侵略的场所。为了使天主教、基督教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在经济上实现“自养”，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处理教产的政策。如中央批准的《关于一九五三年至五四年内进一步基本上肃清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残余经济势力的方案》规定：“外国教会之房产，凡属于宗教事业使用者，原则上应归中国教会所有”。“中国教会自用之外国教会房地产，不论其转移手续是否完备，均可确认为中国教会所有”。经过宗教革新运动，原由外国传教士控制的教产转为中国教会所有，教产已不再是帝国主义用来进行侵略活动的场所。

在上述策略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基督教、

天主教的革新运动进展十分顺利，至1954年，基督教革新运动取得了重大成果，至1957年，天主教革新运动也基本告一段落。

三、宗教革新运动的历史作用

宗教革新运动的开展，于国于教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概而言之，主要有三个方面：

1. 宗教革新运动的开展，实现了中国宗教收回教权、自办教会的夙愿。至1954年，中国基督教会在人事、行政、经费等方面，基本上已经割断了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基督教内的大批外国传教士已经离境，外国津贴已基本断绝，外国基督教会所办的学校、医院及救济机关已被政府接办。在此基础上，1954年7月，中国基督教第一届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回顾了“三自”革新运动以来中国基督教所取得的进步，提出了今后的工作方针。会上，把“三自革新运动”更名为“三自爱国运动”，并成立了全国领导机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选举吴耀宗为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成立，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结束了我国基督教教会长期被西方教会控制的局面，实现了我国基督教收回教权、独立自主的夙愿。

随后，1956年2月，四川省南充教区主教王文成、河北省献县教区主教赵振声、陕西省周至教区主教李伯渔等36位主教、代主教、副主教和神甫、教徒联合发起成立“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委会”。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57年7月15日至8月2日，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罗马教廷传信部不顾上海教区一再提供正式情况，无理否认上海教区选出张士琅为代理主教的合法性，激起了与会代表极大的愤慨，会议通过了《对罗马教廷否认上海教区合法代理主教张士琅的抗议》。天主教罗马教廷干涉中国天主教教务、无理阻挠中国天主教自立、自传的行为，再次深刻地教育了参加会议的代表。会议对于今后中国天主教会同天主教罗马教廷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在其最后作出的决议中强调：“会

议一致认为,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教会的前途,中国天主教会必须彻底改变旧中国时代帝国主义给我们教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实行独立自主,由中国神长教友自己来办,在不违反祖国利益和独立尊严的前提下,同梵蒂冈教廷保持纯宗教的关系,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服从教宗。但必须彻底割断政治上、经济上和梵蒂冈教廷的关系,坚决反对梵蒂冈教廷利用宗教干涉我国内政、侵犯我国主权、破坏我们正义的反帝爱国运动的任何阴谋活动。”^①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选举了由150位主教、代主教、神甫、修女、教徒代表组成的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委员会,中国天主教从此开始了新的历史进程^②。

2. 宗教革新运动的开展,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也有利于国内社会的稳定。应当说,教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革新运动的意义超出了天主教、基督教本身,是整个中华民族反帝斗争和中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此以后,梵蒂冈及其他西方国家想控制中国宗教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因此,强化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大国形象,有效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增强了国民的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同时,通过开展宗教革新运动,惩处了教会内一批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消除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后,潜伏在天主教内的一批间谍分子与帝国主义分子,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他们披着“宗座代表”、“主教”、“神甫”的外衣,刺探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制造谣言,扰乱人心,煽动天主教徒反对人民政府,企图颠覆新生的政权。在开展宗教革新运动的过程中,这些间谍分子和西方传教士的罪行,被觉悟了的中国神职人员和广大教徒群众逐步地揭露出来,公安司法机关则根据其罪行情况,分别做出了予以逮捕、驱逐出境或限期离境的处理。如此,也有利于建国初期的社会稳定。

3. 宗教革新运动的开展,使中国宗教

界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尽管宗教革新运动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党和政府的有力支持和各界群众的热情欢迎,但其实质是由爱国的神职人员和教徒掀起的一次爱国民主运动。通过这次运动,广大教徒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激发了其爱国主义情感,大多数宗教界人士划清了敌我界线,认清了西方国家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罪行。因此,无论是在抗美援朝的运动中,还是在建国初期的其他社会运动中,中国宗教界都表现了较高的积极性。如志愿军出征不久,1950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良模的文章《美帝侵略台湾朝鲜,宗教界坚决反对》,对美国的侵略行径进行了尖锐地揭露和批判。12月2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的文章《基督教徒要抗美援朝》,文章说,从抗美方面说,我们做基督教徒的,要本着耶稣与邪恶势力决不妥协的精神,反对美国及其侵略的、破坏和平的行为;从援朝方面说,中国的基督教徒也有许多可做的事情,无论哪一种基督教徒都不能不配合政府的工作,都应当支援朝鲜人民军和中国的志愿军。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广大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一方面举行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示威大游行,愤怒声讨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另一方面开展捐款、捐物活动,如全国基督教徒捐献了以“三自革新号”命名的战斗机1架,捐款达27亿元(旧币)。同时,宗教革新运动增强了宗教界内部的团结,为此后基督教联合礼拜的推行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总之,建国初期开展的宗教革新运动,既非常必要,也十分及时。运动实现了预期的目标,改变了中国基督教、天主教的“洋教”形象,对中国基督教、天主教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责任编辑:陈寒

^① 《中国宗教团体资料》(第一辑),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36页。

^② 参见赵匡为著:《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60—63页。

试论建国初期的宗教革新运动

作者：[陈金龙](#)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刊名：[人文杂志](#) PKU CSSCI
 英文刊名：[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年，卷(期)：2002, ""(5)
 被引用次数：2次

参考文献(2条)

1. [中国宗教团体资料](#) 1993
2. [赵匡为](#) [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 1999

相似文献(10条)

1. 学位论文 [刘建平](#) [红旗下的十字架——新中国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政策演变及其影响\(1949-1955\)](#) 2008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首要关怀无疑是新生政权的巩固与安全。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作为国内与西方世界联系最为紧密,且意识形态与无神论政党完全对立的团体,自然也就成为新政权必须进行改造以实现对其控制的重要领域。然而,由于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群众性、国际性以及苏联公开反宗教的失败教训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断然宣布两教为敌对势力,进行公开打击,而是允许信徒在“信仰自由”原则下进行宗教活动的同时,借用中国教会历史上已经发展起来的“三自”的血统形式,全力引导和推动了旨在彻底切断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与西方世界联系的革新运动。通过此举,中共新政权不但实现了割断两教与西方世界联系以巩固新生政权的目标,而且完成了对中国教会的初步改造,最终基本上控制了这一被认为是影响其政权安危的特殊领域。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则在这种改造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萎缩和明显的分化。

本文共包括七部分,即绪论、五章和结论。

绪论部分论述了文章的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状况、切入点和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几个重要概念的界定等问题。

第一章从源头入手,分析中国传统的反教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宗教观以及苏联宗教政策的前车之鉴等诸多因素是如何作用于中国共产党的。

第二章从新中国内外政策与教会势力之间矛盾冲突的角度切入,阐述新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的形成过程,并重点考察新政权为彻底割断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与西方世界之间的联系是如何发起两教的“三自”革新运动。

第三章着重论述了中共新政权对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全面清理。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以后,紧迫的危机感促使新政权对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政策日趋激进。在这一形势下,新政权开始全面清理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来彻底杜绝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从中国内部搞破坏的可能。控诉教会罪恶、驱逐外国籍传教士、切断源自西方各国的津贴以及接办教会所属机构等举措,无不体现出新政权的这一目的。

第四章重点考察了新政权为进一步“纯洁”教会而进行的几场重大斗争。在政府的全力引导和推动下,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三自”革新运动虽有相当的进展,但不但是基督教内,还是天主教内,都有对抗革新的势力存在。为进一步推动“三自”革新运动的发展,彻底割断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的联系,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中共新政权在两教内发起了进一步“纯洁”教会的肃清反革命运动。通过此举,两教内公开对抗革新的势力被彻底打跨。第五章分析了新中国宗教政策对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影响。新政权通过一系列措施,将其权力和影响深深地植入了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内,使得原本带有极为浓厚的西方成份和亲西方色彩的基督教、天主教彻底改变了在中国的存在形式。在接受改造的过程中,中国教会的阵地不仅大为缩小,而且其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本文的结论部分对全文作结,指出建国初期新政权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极其复杂,内部充满了张力。首先,建国初期新政权基督教、天主教政策的最大诉求是通过“反帝”的形式来彻底切断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之间的联系,并在这—有着特定含义的“反帝”过程中借用“三自”的血统形式来改造教会,以使中国教会完全脱离西方世界而置于新政权的严密控制之下。其次,虽然宗教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但中共新政权从统战的角度出发,仍允许信徒享有“信仰自由”。与此同时,中共新政权又提出在可能的条件下积极限制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发展,即所谓“缩小(两教)市场”、“限制(两教)发展”的政策。这就使得新政权的基督教、天主教政策变得异常复杂。再次,建国初期新政权的宗教政策不管是对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中国教会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对中共来说,新政权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不仅彻底割断了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的联系,而且在“三自”中完成了对两教的初步改造和控制。然而,若从中国教会的角度视之,情况就完全两样了。

2. 期刊论文 [陈金龙](#). [Chen Jinlong](#) [试论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经验](#) -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00, ""(6)

中国是一个有多种宗教的国家,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几种主要宗教,各自都有不少的信教群众,如何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不可漠视和回避的课题。回顾建国初期中共处理宗教问题的历史,总结建国初期中共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经验,对于21世纪中国宗教问题的处理,富有参考和借鉴意义,本文拟就此作一初略探讨。

3. 学位论文 [刘明生](#) [美国犹太传统教育历史初探](#) 2009

美国犹太人是当今美国社会重要的力量群体,他们在移居美国的350多年里,不仅成功地融入了美国的主流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取得了骄人的业绩,而且很好地保存了自己的族裔特色。在这一过程中,有很多因素在对犹太人的成功起作用,其中犹太传统教育功不可没。美国犹太传统教育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从家庭教育到会堂教育,再到社区学校教育的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特点。本文主要采用文本分析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美国犹太传统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总结出不同时期犹太传统教育的特点。他们在传统教育方面的一些有益做法,对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本文从犹太人移居北美大陆写起,分五部分分别对殖民地时期、建国初期和大发展时期、1880-1924年间以及1924年以后的美国犹太传统教育进行系统地探讨。殖民地时期,美国犹太传统教育主要在家庭中进行。父母承担教育子女的重任。教育内容包括宗教知识、伦理道德和生活技能。重视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培养、重视道德教育、教学方法简单、宗教教育和职业教育并行不悖是这一时期传统教育的主要特点。建国初期至大发展时期,美国犹太传统教育突破了家庭的界限,会堂教育和社区学校教育应运而生。这一时期出现的学校有葡萄牙裔犹太人学校、德裔会众日间学校、私立的寄宿制学校、犹太周日学校以及犹太“使命学校”等。这些学校弥补了家庭教育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美国犹太人教育发展的需要。1881至1924年是东欧犹太人大举移居美国时期。东欧犹太人办起了犹太宗教小学、律法学校和犹太高等学校。这三级学校层次由低到高,以传授宗教内容为主,世俗课程在教学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1924年以后,美国犹太人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欧洲发生的屠犹事件和美国的反犹浪潮使美国犹太人的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空前高涨,他们再次将目光聚焦在传统教育上。美国犹太世俗学校、犹太宗教学校、犹太全日制学校和教派大学纷纷建立。美国犹太传统教育极大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开始凸显。考虑到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现状,结合美国犹太传统教育发展的特点,文章第五章提出美国犹太传统教育对我们的几点启示:重视家庭教育;加强职业技能和民族文化教育;加强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适时进行宗教教育和加强道德教育。

4. 期刊论文 [陈金龙](#)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略论](#) - [民族研究](#)2001, ""(2)

建国初期,随着各项社会运动的开展和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本文拟就建国初期党的宗教政

策的具体内涵、政策制定的历史条件作一初步探讨。

5. 期刊论文 张速婧 试论美国民主制度建立过程中的宗教因素 -长治学院学报2010, 27(3)

在美国建国初期,宗教是其民主制度形成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清教主义作为一种宗教理念,其中蕴含的平等、自由、主权在民的思想为美国民主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思想资源。其次,清教徒早期的地方教会自治制度也有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此外,早期北美大陆教派杂处的状况为政教分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总之,宗教在美国民主制度建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它将继续成为美国民主政治的支撑。

6. 期刊论文 张金桃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党宗教政策及其实践成就研究 -党史文苑(学术版)2007, ""(10)

文章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宗教国情和我党这一时期宗教政策的内容及其实践成就,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建国初的宗教政策。

7. 学位论文 桂治强 论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的建立——以土地革命前中期和建国初期为例 2009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阶段,反观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对目前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土地革命前中期,中国共产党通过铲除旧道德、宗教、习俗、封建礼教,创办“苏式”学校,创造工农大众艺术,创办红色报刊图书,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以及强调党员干部的教育与示范作用等方式,在根据地迅速建立起来新型的社会意识形态,扩大并巩固了中国共产党以及马列主义在群众思想意识中的影响与地位;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肃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影响以转变社会思想意识,改造旧式的学校教育,用文艺发展启发民众的政治觉悟等一些途径,在全社会与新中国的经济、政治比较适应的意识形态体系,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很快在全社会推广普及开来。

通过对这两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经验的研究,笔者认为当前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应该努力做到:第一,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建设,做好引导表率作用;第二,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坚持文化宣传的多样性与时代性;第三,加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造就立场坚定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第四,积极消除各种不良习气、思想的影响。

8. 期刊论文 吴道军 建国初期黔西北基督教历史回眸 -新西部(下半月)2007, ""(8)

该文通过收集整理各类档案、文献资料,回顾了建国初期黔西北基督教各教派发展状况及其组织体系,展现了黔西北地区基督教历史状况,力求对当代宗教研究者及其管理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9. 学位论文 赵伟 当代新疆伊斯兰教问题研究 2006

宗教是一种历史悠久而又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宗教问题既属于人们的思想信仰问题,又表现为社会政治问题。宗教既同政治、经济、法律、道德、艺术、科学、哲学等关系密切,又以特有的“神”力打击教徒的心弦,从而对社会发展、政治稳定产生重大影响。世界各个国家普遍存在着宗教问题,各国政府也十分重视宗教问题,并把宗教政策作为国家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也不例外。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新疆又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边疆地区,伊斯兰教是制约新疆宗教格局的最大宗教。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宗教相比,新疆伊斯兰教信教人口众多,与国外宗教组织联系密切,宗教问题历来是关乎新疆社会稳定的晴雨表。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加之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矛盾、新问题,从而使新疆的民族、宗教问题呈活跃态势。特别是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东突”恐怖势力也借势制造混乱,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新疆的社会稳定和发展构成一定的威胁。因此,对新疆地区来说,如何认识新疆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的发展历史?如何看待伊斯兰教对新疆信教群众的影响?如何总结新疆伊斯兰教工作的历史经验?如何发挥新疆伊斯兰教中的积极因素,减少消极因素,有针对性的制定和执行正确的宗教政策?如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背景下,引导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如何更加理性地看待新疆伊斯兰教的发展等等,都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予以解答。因此,深入系统地研究上述问题,不仅对于党和国家处理好新世纪阶段新疆伊斯兰教问题,做好宗教工作,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且也有助于深化新疆伊斯兰教的学术研究。

论文由导论、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正文共六章。

导论界定了当代新疆伊斯兰教问题研究的范围,论述了研究当代新疆伊斯兰教问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回顾了国内学术界对相关课题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现状及其存在的不足,并简要进行了述评,指出了本文研究的重点和创新之处,阐述了对此课题进行研究时所遵循的思路和采用的方法。

第一章:新疆伊斯兰教概述。主要阐述了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入和发展,论述了新疆伊斯兰教的主要特点,重点对清朝和民国时期中央政府解决新疆伊斯兰教问题的政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通过历史考察,分析了历史上中央政府处理新疆宗教问题的成功与不足之处,为研究当代新疆伊斯兰教问题提供了历史背景,并指出对我们今天制定和执行宗教政策所具有的借鉴意义。

第二章: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新疆伊斯兰教问题。本章主要通过分析建国初期新疆伊斯兰教的复杂状况,阐述了党和国家的宗教理论、宗教政策在新疆的实践。论述了20世纪50-60年代我们党关于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的发展,对新疆伊斯兰教制度的民主改革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和评价,对“左”倾错误和“文化大革命”中对新疆伊斯兰教工作进行的破坏做出历史的反思。

第三章:改革开放以后新疆伊斯兰教问题。本章主要论述了改革开放后新疆伊斯兰教工作经过拨乱反正,特别是随着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的新的的发展,新疆伊斯兰教工作出现的新的可喜局面。针对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新疆伊斯兰教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分析了存在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以及党中央为解决新疆伊斯兰教问题采取的新举措。

第四章:新疆伊斯兰教与新疆社会发展。本章主要论述了新疆伊斯兰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互动关系。

第五章:新疆伊斯兰教极端主义。本章主要论述了新疆伊斯兰教极端主义的涵义、表现及主要危害,分析了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暴力恐怖主义的关系,提出要严厉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

第六章:新世纪新阶段的新疆伊斯兰教问题。本章主要分析了新世纪新阶段全国及新疆伊斯兰教的总体状况,对新疆伊斯兰教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提出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新疆伊斯兰教发展的必然。对如何积极引导新疆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结束语:通过对新疆伊斯兰教问题的分析研究,从中总结出若干带有规律性的思想,对于进一步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今后新疆伊斯兰教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0. 期刊论文 梁晓宇 建国初期毛泽东统战思想探析——纪念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 -新东方2009, ""(9)

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同时创立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理论。1840年恩格斯在批判弗·威·克鲁赫尔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了“统一战线”这个概念,他指出:“在同宗教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结成统一战线。”

引证文献(2条)

1. 温金玉 当代中国社会与佛教组织制度建设[期刊论文]-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2008(2)

2. 杨焕鹏 战后国民政府对民间信仰的控制与管理实态研究——以杭州地区为中心[期刊论文]-江苏社会科学 2007(2)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rwzz200205027.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03bc3a3b-ac10-4a10-9917-9e4d007697f7

